

蘇東坡論

王捷三撰



王捷三遺著

SU DONG PO LUN

WANG JIE SAN YI ZHU



苏东坡论

王捷三 著

苏东坡论

编者：王捷三遗著编辑委员会

印刷：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7.25 印张 190 千字

2003 年 9 月印刷

印数 1—1000 册

陕内资图批字 2003 年 029 号

序一

读《苏东坡论》

王汝涛

20 世纪 40 年代初，读鲁迅先生的《坟》，从《说胡须》一篇中得知先生在 1924 年到陕西西安讲过一次学。后来，又从孙伏园先生的有关文章中得知，去讲学的不只鲁迅一人，还有好几位北京的有名学者。《说胡须》中写道：“陕西人费心劳力，备饭化钱，用汽车载，用船装，用骡车拉，用自动车装，请到长安去讲演……”不经意间写出了组织这次讲学活动的不易和邀请者的诚恳态度。据伏园先生说：邀请单位是西北大学和陕西教育厅，具体经办其事的是一位青年学者王捷三先生，那时正在北京大学就读，还差一年毕业，这一年他也不过二十五、六岁，却为家乡办了这么一件大事。当时觉得这位王先生真是一位既有识见、又有魄力的人，他的名字就深深地铭刻于脑中。

一晃 60 个年头过去了。今年，陆续与在北京、在武汉的几位旧日大学同窗通了音问，也因此，得到了同班王树学学长宠赠的一书一稿，书名《唐代诗人与长安》稿名《苏东坡论》即将出版，都是树学整理的其尊叔遗著。我一看作者的名字，眼光一明，原来其尊叔竟然是王捷三先生——我心仪已久的前辈学人。

认真拜读了书、稿，获益良多。卫佐臣先生在《唐代诗人与长安》的《序》中，详细介绍了捷三先生的一生，使我知道了这位先辈学者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，在促进北京和平解放的和谈中还起到了铺路搭桥的重要作用，对其人其书，有了更加深刻的印象。因为我在教书治学中，曾经由于偏爱，写了些分析苏东坡诗词的论文，树学学长遂命我为即将付梓的《苏东坡论》写一篇序。这序，一开始我不敢写，心知学力不足，不能详尽探索捷公此稿的深厚涵蕴，甚恐降低其价值。嗣后又想：我既觉得因读此书而获“益”，不妨把这点心得写出来，呈献于未来读者之前，与他们读后所得互相印证，也许能使人们从更广泛的角度去理解此书的意蕴。有书在，价值自在，不会因序文粗疏而遭贬低。因此，又欣然（能为素所钦

敬的前辈学者的书写序，怎不欣然）命笔。

书名《苏东坡论》，即说明不是单独评论其诗词或散文，是对其人其文作全面评价的，而捷三先生撰写此稿时，由于种种原因，不能充分展开论述，故今存之书稿字数不多，然而却包含了甚为丰富的内容。对于全书总的评价，我以为应该是这样的：厚积薄发，言简意赅。执一统万、悉中肯綮。新意迭出，具见卓识。

具体说来、此书有三个特点。

一、胸有全局，不陷于片面

苏东坡是一位有名的文学家，他的作品流传到今天的，词近 350 阙，诗约 4000 首，各体散文包括表状、奏议、制敕、内制书简等在内，约接近百万言（林语堂语），要想全面论述苏东坡，按理说，至少必须全部阅览一遍。可实际上，只 4000 首诗，能全部读过的，果真有几人？“苏学”在今天早已成为显学，以苏诗作为研究课题的，写定者堪可充栋，后来者又源源而至。就我所见到的已刊行的论文和专题而言，似乎只看了某几种苏诗选本，就率尔命笔者大有人在，他们引为例证者也就是大家都熟悉、几经反复引用的那一二百首。即使不说陈陈相因，也难免贻人以不全面之

讥了。捷三先生在本书后面附有一个《东坡诗选目录》，虽然只选了供引用的 119 首，却包括了上迄初出夔门、下至谪岭南遇赦而归、定居常州，死前所作的《答径山琳长老》诗。足以证明先生是对 4000 首东坡诗细读一过然后予以筛选的。东坡词，数量较少，通读不难。而本书第 4 章中却全引了《无愁可解》，这是一阕生僻的词，又是长调，一般读者大约是一阅而过了。但此词道出了东坡乐观主义的本根，代表了其人生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（唐圭璋先生编《全宋词》，谓此词为陈慥作，尚不能作为定论）。捷三先生独具只眼，拈出予以阐释，可知全部《东坡词》已罗列于胸中。东坡散文，捷三先生不仅引用其资料性强的书信和《记》类诸文，还引用了代皇帝所草制敕中《王安石赠太傅》以证明东坡对王安石盖棺定论的公允。可见他熟读东坡的全部散文了。惟其通读过东坡的诗词文，才可以说掌握了全部第一手资料，才能高屋建瓴，全局在胸，建构全书章节，决定资料选用，写出一部全面而精当的《苏东坡论》来。

二、正确评价苏东坡的政治生活

苏东坡自 26 岁举进士中制科后，就成为朝廷命官，以后或升迁、或贬谪，有 40 年的政治生活。

而在这个时代，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弊病充分暴露出来了。就有了王安石的变法。捷三先生正确地论述了这件事：“神宗（赵瑛）是一个英明的皇帝，信任王安石，厉行变法，力求富强，八年之间，文治武功成绩昭著。”并举出王安石《前后元丰行》以为证。苏东坡，由于自幼多读儒家书，使他的政治思想趋向于保守，基本上是反对王安石新法的。捷三先生撰此书稿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，那时治文学史者，对北宋神宗哲宗时代的文学家，形成了一种以赞成新法与否划定思想是否进步的定势，捷三先生却并不照样以人划线或以新法划线。书稿中，虽然也写了“力行新法的改革派代表中小地主，反对新法的保守派代表大地主，苏东坡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……在这场斗争中是保守派的健将”，但是却能凭借资料，对苏东坡的政治倾向和对待新法态度的对与错，具体地、正确地给予评价。捷三先生提出的下列两点主张到今天更见得有价值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

1. 苏东坡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保守派政治家

苏东坡的政治思想倾向于保守，是无庸讳言的。书稿中引用了他在神宗熙宁4年的《上神宗皇帝书》与王安石于仁宗嘉祐3年的上书言事相

比较，苏东坡的主张的确起不到改变当时积贫积弱局面的作用。但捷三先生又称苏东坡“有正义感”，这就是先生的卓识了。作为一个政治家，苏东坡的正义感表现在他先后历任八州地方官，大部分任职地方留有惠政：“在凤翔减衙前之害，在开封纠买灯之失，在徐州防治水灾，‘庐于城上，过家门不入’卒能完城保民，以木板护堤，永绝水患；”还有在杭州的复完六井，兴修苏堤，创办病坊，在颖州停凿黄堆，开辟颖州西湖等。这些、在当时均有口碑，并有记载流传于后世。再一点便是他对某些新法的反对，出之公心，绝不杂以私念，发现自己错了时，公开承认。书稿引用了《与滕达道书》中一段话：“盖谓吾侪新法之初，辄守偏见，至有异同之论。虽此心耿耿归于爱国，而所言差谬，少有中理者。”称自己昔年反对新法为“差谬”，人格何等磊落。

2. 对新法以及主持实施新法的人实事求是地区别对待

苏东坡并非“逢新法必反”的人，他久为知州，了解民情，所反对的毋宁说是州县执行得走了样的新法，当司马光当政尽罢新法时，他便坚持认为“熙宁新法，不可尽改”特别是免役法，行

之有效，“虽圣人复起，不能易也”，因此得罪了司马光，又受到政治上的排挤。另外，同为新法的推行人，王安石与吕惠卿、章惇之辈就不一样，前者一心变法，后者则是借变法以谋权位的人。捷三先生分析了苏东坡与王安石虽政见不合，但代草赠王安石太傅敕文中称赞他“少学孔孟，晚师瞿聃，网罗六艺之遗文，断以己意。糠粃百家之陈迹，作新斯人。属熙宁之有为，冠群贤而首用，信任之笃，古今所无。”认为“笔下的褒贬是极有分寸的。”又说“同时作为吕惠卿安置建宁军责词，则极为严厉。从此，可以看出东坡的真实爱憎情感来。”

三、赏析研究饶有新意

对苏轼的研究，前贤早已深入到苏诗苏文的各个领域，可谓成果累累。但读此书稿，仍新意迭见，大有足以启迪后学者。今举主要几点于后：

1. 苏东坡的学术思想，并非单一的，这自然既影响到他的立身行事，又影响到他的诗文书画

昔人有对此课题专门作研究者，却总是爬梳不清。而捷三先生却简要得当、言而有据地分析得清清楚楚。先生指出了苏氏“父子对于五经都有发挥，当然配有儒家的称号”。但又指出同时的

二程提倡“理学”，而理学家“养心必养为无用之心，致虚守寂；修身必为无用之身，徐言缓步；为学必为无用之学，闭户诵读。不尽去其病，世道不可问矣。”苏东坡乃以纵横之学，救理学的迂与空，“志在经世致用。”苏东坡杂用纵横家思想，本于黄宗羲语，黄在《宋元学案》中云：“苏氏出于纵横之学而亦杂于禅”，原带有贬意。先生却看出了纵横家学的积极作用，可称卓识。

先生又说：“我觉得道家自然思想尤其是东坡思想的主要部分。”先生对道家思想，有个全面的了解，曾引用了叶水心的话：“晋衍为玄学，无解于胡羯之氛；唐尊为真经，无救于安史之祸。”但是又认为，当儒家思想“独霸”而暴露其重重弊端，“中间进步人士和革命阶级与统治者尖锐对抗的时候，每每抬出道家旗帜来作为理论的根据与精神的鼓励，进步的文史家如司马迁、王充、陶潜、李白，都具有老庄的浓厚色彩。”具体到苏东坡身上，突出的表现为在政治得意时，他不热中富贵，在《屈原塔》中他写道：“名声实无穷，富贵亦暂热，大夫知此理，所以持死节。”而在政治上失意时，他绝不患得患失，消极颓废。贬到惠州时，他说：“譬如元是惠州秀才，有何不可？”贬

到海南岛后，他的诗“毫无老人衰飒之气”。先生评论说：东坡一生豪迈和旷达的行动，乐观和浪漫的诗文，全得力于庄子。”王安石晚年退居钟山，并非谪贬，又被封为舒国公，但他有诗云：“重将白发傍墙阴，陈迹茫然不可寻。花鸟总知春烂漫，人间独自伤心。”据刘乃昌注释，所谓人间的伤心，“包含着他对坎坷仕途，崎岖人生，落寞处境的深沉感慨。”比起苏东坡的旷达胸襟来，王安石就稍逊一筹了。

2. 对苏轼作品广阔的内容，多样化的风格条分缕析，而归纳为“苏海”，精确地指出其基础为有“真挚的感情”

前贤对苏轼的诗、词、文、赋题材包容的广阔、众口一词，称之为“大家”，捷三先生在书稿中，则首先条分缕析东坡诗文中风格的多样化。指出苏作充满乐观主义精神而不流于颓废享乐。有达观的虚心容物和随处自得。其豪放又开一代的词风，“花间为皂隶，耆卿为舆台”，“一洗绮罗香泽之态，摆脱绸缪宛转之度。”抒情词而有阳刚之气、有别于柳永之阴柔，以幽默为讽刺，意义更深……最后归纳为：“在文学传统中，又吸取了庄子的达观，太白的豪放，陶柳的绮腴，昌黎的险

硬和乐天的平易风趣，汇流为‘苏海’”。在苏轼生前，即有苏才如海的评价。张文潜《赠李德载》：“长公（苏轼）波涛万顷海，少公（苏辙）峭拔千寻麓”。黄庭坚诗：“我诗如曹邨，浅陋不成邦。公（苏轼）如大国楚，吞五湖三江，”黄庭坚在作诗方面，开创江西派，不轻易佩服任何人。他说苏诗“吞五湖三江”也正是从总体方面评价的。捷三先生拈出“苏海”二字，收到对苏诗执一以统万之效。

先生更进一步指出苏轼作品所以脍炙人口，历代讽诵不衰，其基础是“有真挚的情感”。首先分析了东坡对人民的感情，认为最可贵之处即不使自己凌驾于人民之上，自视为“我是识字耕田夫”，“使君无是此中（农村中）人。”其次对朋友、邻居，也都是“肝胆照人”。对于交朋友，他“虽云晚接，数面自亲。”对于邻居，他“邻里有异趣，何妨倾盖新，殊方君莫厌，数面自成亲。”再次“对朋友、师长、兄弟、妻子的真挚之情，读所遗留的书简诗词，真感动人，人情味浓厚之至。”举出了悼念及第时座师欧阳修的《西江月》“三过平山堂下”，悼念妻子王弗的《江城子》“十年生死两茫茫”和怀念兄弟苏辙（子由）的多篇诗词，最

后归结为他有所爱也有所憎，而爱憎皆出于至公之心。

王国维先生论词，倡“境界”说，谓“词以境界为最上，有境界则自成高格，自有名句。”又谓“境非独谓景物也，感情亦人心中之一境界，故能写真景物、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。否则谓之无境界。”捷三先生书稿中有一节专论苏轼作品“多样的技巧”，其中颇多胜解，然而“苏海”、“真感情”二论，已探得骊龙之珠矣。

3. 苏轼不是文艺理论家，但是他由文艺实践中悟得一些带有理论性的东西，颇具指导意，捷三先生归纳为两条

首先，提出了“天工”，而又佐之以“清新。”引《书鄱陵王主簿所画折枝》诗：“论画以形似，见与儿童邻。赋诗必此诗，定非知诗人。诗画本一律，天工与清新。”先生分析说：“天工是写真实的自然主义吧，但照样描写，与照像何异？故‘天工’必得加上‘清新’，有真实，有目标，有选择，主客观统一起来，清新的天工方成为其创作。”元好问《论诗绝句》：“一语天然万古新，豪华落尽见真淳”，“池塘春草谢家春，万古千秋五字新”，大约是受到东坡的启发才能写出这名句的

吧！

其次苏轼提出“咸酸杂众好”这一项不易懂的理论。这是从《送参寥师》中寻绎出来的。东坡在写了“欲令诗语妙，无厌空与静，静故了群动，空故纳万境”，表扬禅空之后，突然写道：“阅世走人间，观身卧云岭。咸酸杂众好，中有至味永。诗法不相妨，此语当更请。”两者似相矛盾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捷三先生分析，参寥是和尚，他写诗当然可以空静为主要内容，但是他又以行脚僧“走人间”，自然更多地接近人间生活。咸酸众味，是人间不可缺少的，故曰“至味永”，参寥更应当领略这种“至味”（先生以为咸酸众味指的是深入生活，是实践）。故东坡的真正主张是“著重发挥文艺必须不脱离群众，要懂得人间的咸酸，才能写出好的文艺来。”《赠参寥师》不是苏诗中的名作，捷三先生却能从中领悟有价值的文艺理论，可见前文中说的“新意迭出，具见卓识”，并非无的放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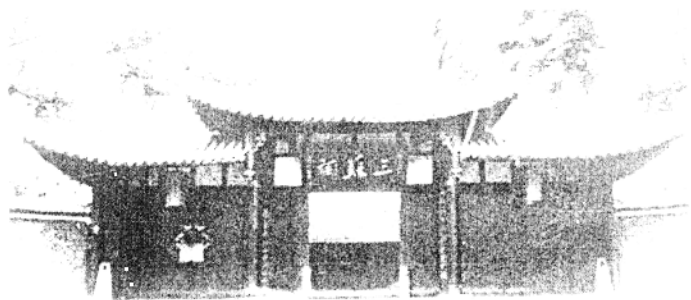
粗浅的读后感写完，作为一个毕生爱好文艺的人，有一点感慨，颇欲一吐为快。捷三先生在“右派”的压力下，尚思为中华文化大厦添砖加瓦，不顾年迈体衰，缺少必要的参考资料，没有助手，

只有白眼，明知写成也没有发表权，却默默地写出三部有价值的著作来，王先生的为人，岂非正是鲁迅先生所赞扬的中华民族的“脊梁”吗？这又使我想到被“投闲”在午门城下的沈从文，默默地积累世界名著《中国服饰研究》的资料。在“五七”干校劳动的钱钟书，默默地写巨著《管锥编》。这些，如今已经成为美谈了。然则，我们今天对于王捷三先生两部著作，岂不应该大大表彰一番吗？

2002年11月定稿

〔编者注〕王汝涛先生，河北文安人。1921年生。1948年毕业于当时南京的国立政治大学。临沂师范学院教授，离休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作协山东分会会员。山东省历史学会顾问，山东省历史学会琅琊文化专业委员会会长。临沂市文联名誉副主席、临沂市社联荣誉副主席。享受国家特殊津贴。

王汝涛先生学术研究成果丰硕。撰写长篇历史小说《偏安恨》、《王羲之》等六部；长篇通俗小说《观世音传奇》；专著：《金瓶梅与兰陵笑笑生》、《琅琊居文集》；校注：《太平广记选》、《续山东考古录》等；编纂：《全唐小说》；主编：《王羲之研究》、《诸葛亮研究三编》、《金秋阳都论诸葛》、《孙臬兵法暨马陵之战研究》、《颜真卿志》。



四川眉县三苏祠